

寫在創刊二十五周年之際

這二十五年內的變化

邱偉平

《二十一世紀》創刊已經二十五年了，這個時候，是需要有一番回顧和前瞻，因為世界變得太快，四分之一世紀的變化，實際上比過去幾個世紀的變化還要巨大。

《二十一世紀》創刊時，正是中國的八九民運之後，寫文章的朋友，都將眼光注視中國，對於中國外面的世界，比較不太注意。今天不然，中國

是世界主要的角色之一，而世界本身的變化，因為全球化更加深入地席捲整個地球，誰也不能躲開世界大勢，遺世而獨立。因此，在這篇文章，我卻是要將世界的局勢作為主題。

1990年，正是冷戰結束的時候，美、俄對峙，意識形態和社會制度差異，固然是重要的原因；其實只是世界爭霸的情勢，導致了兩個陣營長期的對抗。美國雷根 (Ronald W. Reagan) 時代，軍備競爭拉垮了俄國。歐洲復興，又使西方陣營增加了輔助的力量。冷戰結束，並沒有真正為世界帶來安定與和平。當時，美籍日裔學者福山認為，歷史已經發展到盡頭，西方已經形成了一套行之有效的政治和經濟制度，只需要時常做些小修正，就可以維持下去。福山的預言，當時就不能使人信服，後繼的發展更是證明，福山過份相信資本主義和議會制度就是世界最後的局面。這二十五年來的發展，卻是部分地證實了美國政治學者杭廷頓 (Samuel P. Huntington, 又譯亨廷頓) 的話：「下面將要是西方文化與其他文化之間的衝突。」

假如要從歷史上找相對的情勢，今天的世界，頗像中國從春秋轉變到戰國的階段：從兩強對峙，轉變成幾個主要競爭者之間的爭奪。正如春秋時代



一樣，冷戰時期的世界，西方自持為正義和人權的一邊，蘇聯卻根據馬克思主義歷史規律指出的世界趨勢，自以為順應着歷史潮流，選擇了最準確的方向。這一種理念的差異使雙方都以為自己是對的一方。最近二十五年來的變化，由於中國的崛起和歐盟的逐漸成形，世界的牌局從兩個棋手的圍棋，轉變成四方參與的麻將或是橋牌。雖然還有些人，尤其西方的政治家或天真的思想家，堅持着理念的正義，實際上，這一個牌局，不是理念的問題，彼此競爭的力量，寄託於經濟大於軍事。整個世界的布局，又逐漸呈現地緣政治上的戰略空間，那才是真正戰場所在。

借用圍棋的術語，冷戰時期兩個棋手，各自搶「金角」、「銀邊」，中間的一塊「軟腹」，也就是世界發展中國家和未發展國家，還可以置身事外。今天，四個玩客，已經佔滿了「金角」、「銀邊」，未來的勝敗，是在爭取地緣政治上的戰略要地。這些地方，既是資源之所在，也是資源運送的要道。更為肯定地說，整片腹地，最要緊的是中東，次要是非洲，然後才輪到南美和海洋的一些島嶼。

內亞與中東地區，恰好是伊斯蘭教文化的地區。自從奧圖曼 (Ottoman) 和莫兀爾 (Mughal, 又譯蒙兀兒) 兩大回教帝國的舊地，在西方資本主義帝國擴張過程中，被英國為首，法、德為副，逐漸吞滅；伊斯蘭教本身，又始終無法自拔於中古的理念，與時俱進，以至於無法和現代世界有正常的對話；二十世紀，當世界各處都在走向現代文明時，這個伊斯蘭世界，除了土耳其等少數幾處外，大半的部分，仍舊沉淪於西方殖民地的境界。中東的油田，以及東西通道必經的戰略意義，使其成為現代資本主義國家競爭市場和發展勢力的必爭之地。

由於伊斯蘭教內本身有民族主義與宗派主義的種種衝突，加上伊斯蘭世界這一大片土地上，兩百年來找不出一個真正的核心，足以統攝全區，於是，中東成為鬥爭的戰場，內外衝突，從無寧日。那些受盡了委屈，長期在西方剝削和壓迫之下的穆斯林，一方面彼此衝突，另一方面則將怨氣宣洩在西方的身上。最近多少年來，尤其2001年的「9.11」以後，伊斯蘭的恐怖活動成為世界矚目的焦點。「基地組織」(Al-Qaeda, 又譯阿爾蓋達、凱達)、「神學士」(Taliban, 又譯塔利班)、「伊斯蘭國」(The



伊斯蘭世界這一大片土地上，兩百年來找不出一個真正的核心，足以統攝全區。(資料圖片)

Islamic State) 等組織發動的恐怖活動，天天見於新聞報導。有許多人就以為，伊斯蘭教是一個暴力的宗教。追溯起歷史背景，過去英、法在中東的發展，破壞了當地的原有秩序——割裂為許多跨越族群與教派的國家，遂造成今天的混亂局面。

自從1991年海灣戰爭以來，美國代替了當年的英國，以其強大的國力，一處又一處，直接地介入中東的紛爭。二十五年來，美國陷入泥沼，無法自拔，中東動亂，也愈來愈複雜。

最近幾年來，伊拉克和敘利亞成為戰場，軍閥建立的政權，地方的部落力量和不同教派先後取得國家領導地位；這些力量之間的糾纏，加上美國的參與和以色列在當地的霸道，戰爭不斷，使這裏的居民無法生活，不得不大群外逃，形成歷史上罕見的難民潮。

2015年9月，俄國的軍隊已經進入敘利亞，這一發展將揭開中東成為地緣政治戰場的新形勢：首先是美、俄在這地方的直接交手；下一步的發展是，俄國勢將籠絡土耳其和埃及，逐漸與中東的當地力量結合，力求取得中東的優勢地位，以爭取世界棋盤上「軟腹」地區的控制權。同時，中國正在發展「一帶一路」的國家戰略；實際上，中國已經取得波斯灣口的一塊基地，也正在試圖取得紅海南方、非洲東岸的一塊基地。中國和俄國勢將聯手將美國和歐洲逐出中東，獲取這塊腹地的主導權。

下一步的鬥爭，大概是在非洲那片廣大的大陸。非洲是歐洲殖民主義的第一批犧牲者，整個非洲的教育程度、經濟發展都還不夠，他們對西方帝國主義的舊仇新恨，以及伊斯蘭教的信仰，都使得這塊土地上的人民可能因為對西方的仇視，會傾向於和中、俄連結；然而各處的政權和社會上層，還是和西方殖民宗主國有相當的關係。由此看來，這一塊土地或將是下一波動亂之所在。

整體言之，中東的伊斯蘭和西方國家之間的鬥爭，表面上是證實了杭廷頓的預言。實際上，在四強對抗中，地緣政治因素，加上歷史上中東和非洲對西方的舊仇，卻可能比文化衝突的因素更為強烈。杭廷頓提及文化衝突時，將中國列入儒家文化疆域，認為中國和西方的對抗，也是文化之間的鬥爭。他沒有認識到，今天的中國，經過文革的極度斷喪，儒家傳統已經淡去。今天的中國，由於經濟力量崛起，已是世界棋局參賽者之一，正是世界領袖國家——美國，所不能放心的另一個挑戰者。

中國與中東/非洲，沒有歷史上的恩怨，擔任調停角色，比較能有迴旋餘地。如果中國介入這一地區事務，應秉持「仁道」以大治小，幫助他們發展經濟，以本土資源，利用厚生，推動教育，開啟民智，以進行現代化；至於宗教信仰，則不宜介入，只能善盡調停，力求和平。中國歷史上，對於周邊族群，數千年來，大致遵循這一原則，以維持東亞的秩序。今後中國還是應當持此態度，善盡大國責任。

二十世紀以來，世界人口增加了兩三倍，而科技與工業生產的發展，提高了世界大部分地區人口的生活水平。整體言之，巨大的生活需求使人類必須尋求更多的資源，包括能源和生活資料；資源和商品的流動，將世界各地經濟納入一個全球網絡，各地的經濟發展息息相關，誰也不能置身事外。一方面，取得資源成為互相競爭的先決條件；另一方面，市場的吐納又將各地經濟拴在一起，誰也不能離開誰。這一弔詭的形勢，乃是世界列強必須面對的局面：強者不能互容，而經濟活動也不能獨佔。杭廷頓指出，世界將有不斷的鬥爭，其實與文化問題關係不大，而是新的經濟形勢導致爭霸的狀態。

今天世界，在文化方面確實面臨一些難題。西方世界發展的現代文明，一方面是資本主義，另一方面是工業生產，如此形成了一套政經體制。西方自從擺脫封建社會以後，發展了一套議會政治的民主制度；為了強調資本主義下的個人主體性，自從啟蒙時代以來，就從基督教的信仰延伸為「天賦人權」的理想，即今天所謂的「普世價值」。這套植根於西方文明發展歷史的理念，瀰漫全球，最近卻面臨嚴峻的挑戰。

資本主義是以個人主義為基點，尋求自由競爭的市場，要求國家代表的公權力保證個人行為思想的自由。自由競爭的後果，難免會落入弱肉強食的局面，於是，才有社會主義思想，為了要求人間的正義，盼望有一個保證公平分配的公權力：強力的社會主義的集權體制。二十世紀前期，世界經濟大恐慌，已經顯示資本主義在過度自由發展之後，分配極度不均，強者愈強，弱者愈弱；資本的集中，使財富成為少數人獨佔的工具。社會主義在俄國的實踐，呈現其集權專制的面貌；大家因此轉而尋求另外一種比較和平的手段，以矯正不平等：社會福利國家的理念，遂在各處逐漸落實。

最近這一個世紀以來，美國數次經歷經濟恐慌，每次調整都只是局部而短暫的；中、俄兩國實行社會主義的失敗，又使共產制度失去信用。這個放任自由發展的後果，會脫韁奔馳，以至於在世界各處，都已經呈現日趨嚴重的貧富差距。

資本主義的既得利益階層挾其財富，已經可以完全操縱政治，民主制度的理想，實際上只剩一個軀殼。以美國而論，百分之一的人口，擁有百分之六十以上的財富，不到一百個大財團，可以決定美國選舉的結果。於是，公權力已經不能執行「裁判」的角色。

貧富差距，逐漸在國內和國際間，造成弱勢與強勢之間的對立；世界如此的分化，更使中產、中層部分逐漸減弱，以至於消失。在少數既得利益的強勢者挾「國家」公權力的威勢下，弱勢社群並無抗拒之力。弱勢個人，其實難有影響國家公權力的可能性，所謂「普世價值」，成為空言。這二三十年來，各處工會力量大多萎縮，各處常有規模的群眾運動，例如美國的「佔領華爾街」(Occupy Wall Street)，但哪一次真正能發揮有效的抗議作用？現代文明的基石之一——資本主義，在每次經濟恐慌時，都暴露了其中欺騙、操

縱、掠奪等等的罪行，使得市場經濟中，那一隻「看不見的手」實際上成為少數利益集團操縱傀儡的提線。「個人」的自由，並不顧及對於「群體」的責任。

現代文明的另一個重要支柱，則是現代科學。現代科學本身，是以理解釋各種存在事物；可是，工業生產要求科學與技術合一。科學理念於是成為應用價值的另外一個意義。為了應付人類整體對自然資源的巨大需求，經由科學研究，人類獲得了許多將資源轉化為生活資料的手段。最近這四分之一世紀，工業生產的主力，從化學與機械動力逐漸轉向；現在的科技主力，則是生物科技、自動化和人工智能。再加上資訊科技的發展，也就是所謂電腦化和數據化，用於處理和傳達大量訊息，這一切對現代人的日常生活產生迅速而巨量的影響。

在化學掛帥的世代，殺蟲劑和肥料，已經破壞了生態環境；今天基因改造以及其他的生物科技手段，又進一步地改變了物種之間的平衡。大量能源的浪費，既改變了氣候，也改變了空氣與水的品質；凡此，都直接導致人造的災難。這些本來基於創造人類福祉而發展的科技手段，卻使人類生存條件出現了幾乎無可逆轉的困境：巨劫將至，何所逃避？

如前所述，現代文明的「普世價值」，其根源與基督教信仰有密切的關係。人類對未知的力量，本來存有一番敬意，也基於這番敬意，才尊重人與人之間的公義和公平。科技發展以來，尤其人工智能和自動化，已經將人的智慧，逐漸解讀成為可以操縱和改變的特質。而生物學演化系譜的研究，追溯到生命的本質；人類已經嘗試創造生命。

宇宙物理的研究，一方面使我們將整個宇宙，看做「物」的結構，另一方面，對於「能」的理解，到現在還無法解決。物理學和太空研究的理論，既使宇宙的秘密逐漸有解密的可能，卻又同時使我們感到置身於大宇長宙的渺小。十八世紀科學主義，賦予人極端的樂觀；今天的科學發展，在形上學的層次，卻使我們有無力之感。

現代文明面臨的窘境：資本主義與科學兩方面的困境，再加上人類爭奪生存空間，難免因此導致競爭；亦即世界棋盤上的四個棋手，正在將彼此之間的競爭，提升其強度和嚴重性。可是，世界已經是因為同樣的原因，成為密不可分的一片。在既鬥爭又必須共存的兩難局面之下，世界何去何從？我們應該如何選擇？這些都是眼前無法躲開的重大課題。

《二十一世紀》創刊以來，這二十五年的時間，確實是我們親眼目睹世界正在面臨重大改變的時期。此後，各種改變都將加速進行，我們必須將這些課題列入焦慮的項目。盼望《二十一世紀》在這一領域，有更多的討論。在這一論壇上，大家經由集體思考，找到真正的「普世價值」，使個人與群體之間，自由與責任之間，進取與節制之間，能保持適當的平衡。